

Milovan Djil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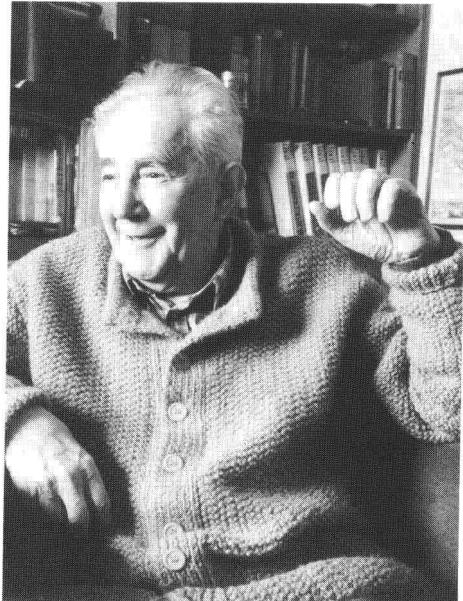
米洛万·吉拉斯的 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项佐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感谢“北京大学惠卿东欧教学与研究基金”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米洛万·吉拉斯的
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项佐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 项佐涛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2.8

ISBN 978-7-5117-1476-3

I . ①米…

II . ①项…

III . ①吉拉斯, M. (1911—1995)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 ① D09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4965 号

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出版人 刘明清

策划编辑 贾宇琰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琦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11 (编辑室)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76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向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阿勒科萨·吉拉斯

非常遗憾，我没有学会中文，因而无法享受阅读这本关于我父亲的新书的乐趣。不过，尽管我无法知晓该书的具体内容，我对项佐涛博士——一位研究者和学者却着实了解颇多。

在 2008 年 11 月，我第一次听闻项佐涛先生和他的工作。他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作为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正在撰写有关我父亲米洛万·吉拉斯——南斯拉夫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我立即回信说，非常高兴得知他能够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愿意为他提供信息和建议。不久，我又了解到项佐涛先生从事相关研究已有四年，并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评析》。

次年 9 月，项佐涛先生来到贝尔格莱德。我们见面了。他是一个乐观的知识分子，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已预料他知识渊博，却仍因他的许多深奥想法和问题而惊讶。我也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发现《新阶级》有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另一个来自台湾，哪一个更好？基于对两个版本的细读和比较，他明确回答说中国大陆的版本好得多。我追问其原因。他回答说，大陆的翻译者更勤奋、更守纪律、更加谨慎。

我很快发现，项佐涛先生虽然对米洛万·吉拉斯怀有同情，但他主要是一个学者，一个寻找事实并试图分析它们的科学家。在贝尔格莱德逗留（超过两个月）的整段时间，他都埋身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他发现了许多有关我父亲不为人知却又非常重要的文件，那些来自铁托档案馆、通常带有铁托亲手批示的文件尤为重要。事实上，塞尔维亚的学者和记者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正在部分使用这些宝贵的材料。

我们的谈话范围比手头的研究更广泛。我发现，项佐涛先生在一系列关涉社会理论的问题上知识渊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对政治理论情有独钟，他的见地令人印象深刻。他还是一个豁达、宽容、随时准备接受批评的人。我们的结识给了我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通过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来了解中国。项佐涛先生为中国取得举世无双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及其在世界上与日俱增的影响而自豪，然而，他也同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正在失去更深层次的道德指针、过度地为金钱和名誉所驱使的忧虑。当我提到在塞尔维亚和所有前南斯拉夫都存在同样问题，并补充说毕竟物质主义是一个西方通病时，他并没有感到宽慰。

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我尤为感到米洛万·吉拉斯的高明之处，因为我们共同的看法都与他的深层遗产有关。米洛万·吉拉斯意识到，无论从意识形态背景、时代的紧迫性或者哲学指向性看，物质主义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基本的道德挑战。

我相信，项佐涛先生将会对中国的学术生活，在更宽泛意义上对那里的智力生活作出宝贵贡献。我希望他的书很快会以英语和塞尔维亚语出版，从而让更多读者从他的见解中受益。

2012年2月2日
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执著的回报（代序）

孔寒冰

《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一书即将出版，项佐涛博士嘱我写点文字，我感到十分荣幸。博士学位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或者直接出版，如念旧情再请曾经的导师写个序，在今天非常流行，都无可厚非。表面上看，项佐涛的这本书也没有摆脱这个俗套。但是，相比之下，项佐涛及其这部著作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项佐涛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本的专业是外交学。在二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他上我主讲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基础课，开始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四年级被保送硕士研究生之后，他把研究重点放到吉拉斯的生平与观点上面。在我的指导下，项佐涛2005年完成了《吉拉斯的“新阶级”概念分析》学士学位论文，2007年完成了《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完成了《吉拉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演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前后算来，项佐涛系统研究吉拉斯长达七年之久，不仅对吉拉斯本人的生平与思想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比较全面地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先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其中，与本书相关的就有《苏东“异端”社会主义者的反官僚化思想》、《解析“吉拉斯事件”》、《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吉拉斯“异端”思想的发展历程》、《解读吉拉斯现象——评西方学者对吉拉斯及其著述的研究》、《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剖析》。除此之外，他还协助我主持了教育部重大社会科学项目“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现状研究”，今年与我一起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现状和社会

主义思潮研究”。

项佐涛对吉拉斯的执著研究得到了北京大学和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先后获得了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一等空缺）、《环球时报》有奖征文一等奖、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北京大学“青春的榜样——优秀研究生”、“学术十杰”和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等称号。

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项佐涛进入中共中央编译局进行博士后研究，不久又到美国凯特琳基金会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继续在更宽、更深的层次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在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项佐涛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改、充实和完善，形成了《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这部极富学术和思想内涵的著作。

吉拉斯是20世纪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特殊”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从前南斯拉夫的三号领导人变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还因为他撰写的旨在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新阶级》一书在冷战期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根据该书内容，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不是在朝着无阶级、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而是建立了一个以共产党内异化出的特权官僚为统治阶级的新的剥削阶级制度。在冷战期间，上述观点是爆炸性的，尤其是当它出自于一个共产党的前领导人笔下的时候。东西方国家对吉拉斯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西方国家视其为一个义无反顾地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苏联和东欧国家视其为一个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叛徒。因此，客观评价吉拉斯及其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于七年多的认真研究，《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一书摆脱了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评价，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吉拉斯，他是追求民主又不盲信西方式的民主，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又不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吉拉斯从最初信奉斯大林主义到最终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恰恰展现了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变化。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对待吉拉斯，正是研究吉拉斯政治思想的前提。

吉拉斯及其《新阶级》在中国都有不小的名气，但是，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在项佐涛开展研究前，国内关于吉拉斯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项佐涛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图书馆搜集资料，找到了《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铁托：内幕故事》以及吉拉斯的大部分英文版著作。为了熟悉当前国外相关研究的状况以便站在国际相关研究的前沿，项佐涛通过同学和朋友的帮助获得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乔治敦

大学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等收藏的相关英文资料，此外，还购买了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数据库和 WorldCat 数据所收藏的相关学位论文。2009 年，我们一起在贝尔格莱德拜访吉拉斯的儿子阿勒科萨·吉拉斯时，他感叹于项佐涛掌握的英文资料之全面。但是，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光依靠中英文材料是不够的。西方人翻译的英文文献大都是他们所感兴趣的，而吉拉斯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并不多。为了获得和研读塞文资料，项佐涛自学了塞文，并在“北京大学惠卿东欧基金”的资助下到塞尔维亚搜集资料。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图书馆、吉拉斯儿子所建的吉拉斯图书馆、南斯拉夫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项佐涛不仅搜集到了吉拉斯撰写的大量未译成英文的作品，还搜集到了研究吉拉斯的塞文著作以及大量的、英美研究者鲜有涉及的档案资料。正是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项佐涛写出了很有学术分量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受到了广泛好评，答辩决议写道：“论文收集了大量有关的中外文资料，包括吉拉斯的主要著作、对吉拉斯的各种研究性著作、关于吉拉斯的个人传记材料、档案资料等在国内很少为人所知的资料以及其他各类文件，对吉拉斯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其中的脉络、吉拉斯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特别是吉拉斯的‘新阶级’说，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论述。论文的资料充实，论据充分，论点明确并有翔实可靠的证据为支持，文字规范、简洁、有力，逻辑严密，视野较为广阔，从而使得整个论文具有比较令人信服的力量；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论文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总起来看，该论文在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应该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项研究成果。”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人们可以通过资料来发现历史，但资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这不仅是因为当事人对于不想为人知晓的事情不记录档案，甚至销毁档案、篡改档案；还因为材料是死的，人物是活的，资料难以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是材料的堆积，而是基于材料的再创造。为了更好地解释吉拉斯政治思想演变的动力，项佐涛试图深入吉拉斯的内心世界。为此，他采访了吉拉斯家人、朋友，采访了黑山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了解他们对吉拉斯、吉拉斯家族、黑山民族的看法。这些采访帮助他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吉拉斯性格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而这是档案材料所无法提供的。同时，资料是散的，是细节。好的作品需要一个位于材料之上的、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统领材料。只有超越资料，才能更好地使用资料。否则，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一书把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放到了一个更宏观的环境

中考察，即苏联模式在苏东国家的实践。作者把苏联模式在苏东国家的实践划分为确立期、弊端暴露和改革期、改革中止或失败期、僵化期、危机和崩溃期等五个阶段，对应着吉拉斯政治思想演变的斯大林主义者时期、铁托主义者时期、吉拉斯主义者时期、提出“新阶级”论时期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时期等五个阶段，通过材料的分析、加工和综合，建构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并没有狭隘地将视角局限在吉拉斯一个人身上。通过个案的研究，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苏东国家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以及一个观察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维度。在这些国家，吉拉斯式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他们曾经是斯大林主义的崇拜者、赞美者，曾经把苏联模式看做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不二选择。然而，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他们成为了苏联模式的批判者和改革者，并因为观点不为当权者所容最终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然而，持不同政见者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吉拉斯式的知识分子正是把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便是在苏东剧变后。诚然，尽管受个人情感、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的限制，吉拉斯式的知识分子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都有局限性，但是他们所批判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问题、领导干部官僚化现象问题、思想控制问题等等，都是苏东国家普遍存在的通病和苏东剧变的诱因；他们基于苏东国家当时特殊环境所提出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吉拉斯政治思想研究的意义还不局限于此。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就是要改变苏联模式的弊端，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正确总结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生长点，而吉拉斯式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正为我们认识苏联模式、探索苏联模式的替代方案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总的看来，在人们喜欢享受快餐文化的浮躁年代，项佐涛能够从本科论文到博士论文一直致力于吉拉斯问题的研究，克服种种困难在中国、到美国、去塞尔维亚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近于十年磨一剑，写出这部20万字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样厚实的基础，我相信项佐涛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

目 录

导 言	1
一、观察苏东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维度	4
二、吉拉斯及其政治思想的相关研究述评	13
三、本书的逻辑结构和方法	29
第一章 吉拉斯政治思想的起源	33
第一节 黑山的历史遗产对吉拉斯性格的塑造	35
第二节 黑山的现代化境遇与吉拉斯共产主义情结的萌生	40
第三节 吉拉斯早期的共产主义实践	45
第二章 斯大林主义者：赞美和移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53
第一节 “迷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55
一、苏联模式初期的正面效应	55
二、吉拉斯对苏联模式的歌颂	59
三、吉拉斯在移植苏联模式过程中的作用	63
第二节 吉拉斯访苏及其对苏联模式的初始质疑	69
第三章 铁托主义者：批判苏联模式与推进南斯拉夫的改革	77
第一节 苏联模式的弊端与南斯拉夫的改革	79
一、苏联模式的空间适应性与苏南冲突的本质	79
二、南共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改革	85

第二节 吉拉斯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91
一、违背列宁学说的大国沙文主义	91
二、官僚阶层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	97
第三节 吉拉斯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构想	100
一、取消意识形态垄断	100
二、取消“党代管”制度	104
第四章 吉拉斯主义：超越铁托改革的限度	109
第一节 南斯拉夫改革苏联模式的限度	113
一、苏联模式的多层次性与南斯拉夫改革的底线	113
二、“铁托开民主化改革的倒车”	117
第二节 超越铁托改革限度的吉拉斯主义	123
一、吉拉斯的激进改革观	123
二、吉拉斯主义遭到批判	129
三、社会角色的变换与吉拉斯激进思想的发展	136
第五章 “新阶级”论：对苏联模式的系统批判	143
第一节 “新阶级”论的主要内容	145
一、“新阶级”的内涵	145
二、“新阶级”的统治形式	147
三、“新阶级”的历史角色	149
第二节 “新阶级”论产生的现实根源和理论积淀	152
一、苏联干部官僚化现象	152
二、先于“新阶级”论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官僚化思想	160
第三节 “新阶级”论评析	171
第四节 “新阶级”论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反官僚化理论比较	180
第六章 苏联模式的“异端”：追求“民主的社会主义”	185
第一节 追求“民主的社会主义”	187
一、苏联模式危机的总爆发	187
二、吉拉斯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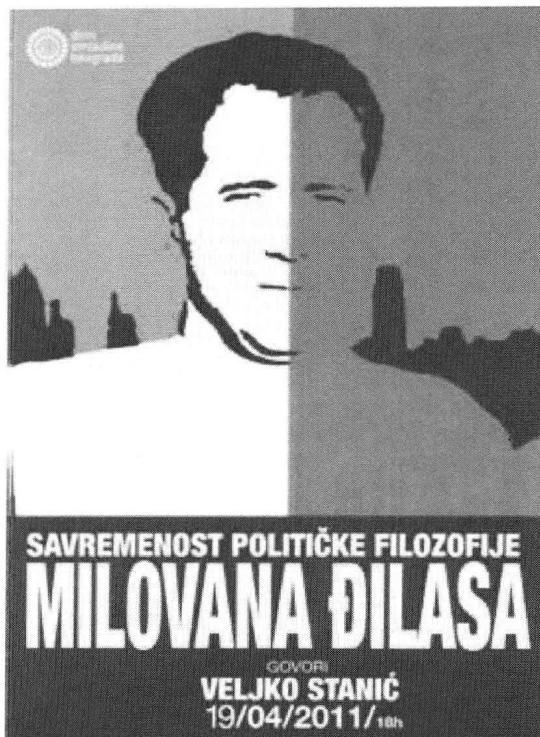
第二节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	199
第三节 冷战双方对吉拉斯的不同评价	202
一、西方人心中的英雄	202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端”	207
结 语	213
参考文献	221
致 谢	239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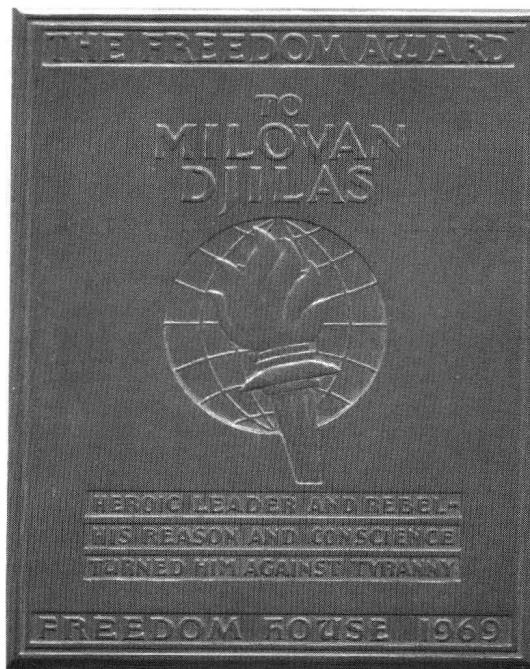
◆ 观察苏东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维度

◆ 吉拉斯及其政治思想的相关研究述评

◆ 本书的逻辑结构和方法



◆一场关于吉拉斯的讲座所用的宣传图片，摄于2011年



◆吉拉斯的自由奖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证明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20多年来，不同国度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苏东剧变的原因作出了解读。比如，有学者认为是由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的改革政策失误；有学者认为是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还有学者认为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在诸多看法中，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即苏联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执政的共产党内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严重的官僚化现象，并滋生了一个通过垄断政治权力来控制和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官僚群体。^①官僚群体^②只是苏东国家党政领导干部中的一部分，却因大权在握、行

① 参见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命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官僚的概念由法语“bureaucratie”引申而来。法语的“bureaucratie”相当于英语的“bureaucracy”。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中，“bureaucracy”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官僚制，被用来指“通过政府官员而不是民选议员来推行大多数重要决策的一种政府体制”（〔英〕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阎步克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或者“以专业化职能为特征的政府，其权力的行使有严格的规则和等级；又指一种负载着过分复杂的管理任务而又缺乏灵活性的笨拙的行政管理体制”（Judy Pearsall,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243）。第二个含义是指称官员们的一个群体性概念，例如，马克斯·韦伯把“bureaucracy”称为“一个由于掌握着专门知识和职位而脱离人民的官员特权阶层”（〔美〕埃兹昂尼·哈利维：《官僚政治与民主》，吴友明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4页）。

由“bureaucracy”产生出来的“bureaucrat”指一个官僚，“bureaucratic”指官僚式的、官僚化的，“bureaucratism”指官僚主义。（参见竺乾威：《官僚政治》，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页）本书为了避免“bureaucrat”和“bureaucracy”翻译成中文造成的歧义，使用“官僚”一词作为官僚的单数等同于“bureaucrat”，使用“官僚群体”作为官僚的群体概念，等同于“bureaucracy”。引用的中文资料保持原文说法。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官僚和官僚制的看法与西方学者有某些相似之处，认为官僚作为一个群体是一个依附于统治阶级的阶层，官僚机构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指出：官僚是国家中形成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官僚机构就其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是国家的唯灵论。（参见〔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70页）然而，与西方将官僚和官僚制作为专业化和中性化的术语使用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官僚和官僚制等同于官僚主义。“在革命胜利后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和‘官僚制’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同义语而被到处滥用，并试图将其从政治实践中加以消除。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导致了在对官僚和官僚制概念的理解上，几乎完全失去了行政理论中的中性色彩”（张剑玉：《官僚制与现代民主政治》，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页）。

苏东政治发展给西方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提出了难题：一方面，官僚群体所依附的阶级是什么？名义上作为统治者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处于无权的状态，官僚群体并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负责；另一方面，官僚制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而是一种全面的社会管理形式，官僚机构的触角无孔不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问题探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吉拉斯的“新阶级”论就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解答。按照吉拉斯所说，苏东国家的官僚主义者不是西方行政学意义上的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的文职人员，而是一个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扮演剥削阶级角色的“新阶级”。苏东国家的官僚制也不再是行政管理体制，而是一种异化的官僚制——“新阶级”全面控制社会的方式。

使着本应为民众服务的公共权力谋取自身利益，严重影响了执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损害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在剧变之前，苏东国家就存在着一种批判苏联模式尤其是共产党内领导干部官僚化现象的声音。然而，由于挑战的是苏东社会主义体制，这种声音不为当权者所容，多半是以不同政见的形式发出的。

苏东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①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说它特殊，是因为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由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组成的群体。这些人的观点良莠不齐，激进和保守并存。有人鼓吹民族主义，有人主张宗教自由，有人提倡保卫人权，有人谋求在苏东国家建立西方式的社会制度，有人希望在苏东国家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等。说它重要，是因为尽管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们批判的矛头共同地指向了苏东国家所有问题的症结——当政者内部存在的官僚化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苏东剧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了时代的风云人物，在改革中充当马前卒的角色”^②。例如，苏联的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萨哈罗夫（Andrey Dmitriyevich Sakharov）和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波兰的沙夫（Adam Schaff）和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捷克的锡克（Ota Šík，也译希克）和哈维尔（Václav Havel），南斯拉夫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译作德热拉斯、杰拉斯、德吉拉斯）等都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可以说，如果领导干部的官僚化是苏东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腐蚀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异化于社会主义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把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看做是这些国家广泛存在的一种反官僚化的、异化于苏联模式的现象。

吉拉斯作为苏东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研究其从斯大林主义到“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演变，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苏联模式的利弊，更好地认识苏东国家的干部官僚化现象和持不同政见者现象。

一、观察苏东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维度

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境遇下展开的。它既要完

^① 英语为“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词最初用来描述那些虽然信仰基督教，但因所属教派并没有在该国占统治地位而被正统教派仇视和迫害的人。后来，西方国家用这个词指代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一批敢于表达不同于官方观点的人。参见田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概念考证与辨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②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成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取代，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①，又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方式的强国之路。然而，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二者是难以同步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是不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没有发挥殆尽之前到来的，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之前，苏东国家的资本主义均不足为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甚至在某些国家还没有发展起来，是直接从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③跳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没有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的物质和文化前提下，社会主义实验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政党会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取得政权。不过，他的预言是悲观的。恩格斯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都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终究要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

① 作为一种理想或者对一种社会制度的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作为一种学说或者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自己的主张与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区别，称自己的学说为共产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野的过程中，列宁为了表明自己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把俄国党的名字改为共产党。后来，列宁还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共产党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都遵循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称本国为社会主义国家。西欧社会民主党以及对共产党政权持有敌意的人则把这些国家称为共产主义国家，意指它们不是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书作者在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时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引述他人观点时，保留他人的概念；第二，表达本书作者个人观点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更大范围的概念，共产主义只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学说，因而共产主义者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则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③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思提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形态时，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参见同上，第592页）。不过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作具体论述。20世纪20、30年代，共产国际曾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过专门讨论。1929年后，由于受当时苏联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在1931年于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会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被正式定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其论者亦被看做是托派的代言人。（参见季正矩：《国内外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观点综述（二）》，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共产国际的讨论中断后，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美国学者魏特夫在1957年提出“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于由治水而形成的东方专制主义。（参见〔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魏特夫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